

■ 新作聚焦

滕肖澜长篇小说《平衡》:

每个角色都在寻找人生中的“平衡”

□ 潘凯雄

滕肖澜作品我读得不多,但在有限的阅读中却留下了两点比较鲜明的印记:这是一个能写上海、会写上海,特别是浦东新区的好手,过往的《心居》和《城中之城》两部长篇小说便是佐证。这不奇怪,作为中国现代化起步早、经验足的大都市,从上世纪初延续至今,在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史的记载中,少不了这片土地上女性作家在这一领域的重要作品。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善于抓住某一时段沪上某个焦点来表现上海的女作家,如《心居》之于房地产、《城中之城》之于现代金融业,等等。

梦境与现实是“平衡”的两翼

我正是抱着这样的既往经验开始进入对滕肖澜长篇小说《平衡》的阅读,读至两三页,不免有些许疑惑:这女子咋就写上新武侠了?那一招一式、一言一字莫不如此。所幸这不足两千言的文字只是为了引入本作品的主要表现手段之一:梦。原来这是一个梦,不过一个梦而已,但“梦”这种特定的生理现象,恰又是滕肖澜在新作中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没有这个开场的梦以及接下来一连串的梦,所谓“平衡”必需的两极就缺失了其中的一大板块,“平衡”亦无从说起。

“平衡”二字在新作中既有明确的具体所指,也有作家赋予它的独特含义。所谓明确所指,即为机场地勤业务诸多项目中的一种:将一架飞机上的乘客、行李和货物如何均衡地分布到机舱各处,让飞机保持前后左右的平衡,以确保安全飞行。说实话,我不敢妄言究竟有多少乘坐过飞机的人,知道机场地勤业务中还有这样的专业分工。起码我本人对此是白了一个。但滕肖澜在成为专业作家前,恰是在浦东国际机场从事过10多年“配载平衡”的地勤工作,在她手上不知画出过多少张“平衡表”,估计她自己当初也未必预料到那种在“配置第一块板的时候,就要想到第二块、第三块乃至最后一块。不能顾头不顾脚”,“每块板之间都有联系不断摸索、左右权衡的状态”会成为自己日后创作灵感的触发点乃至内容的主要构成之一,这也就是生活的积累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意义。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滕肖澜仅仅只是以机场地勤工作中的“平衡”这一专项业务为素材写成小说,合理设计一些“失衡”的场景及事件,或触目惊心、或命悬一线,都有可能成为一部好看的颇具可读性的职场小说,也不乏改编成影视一类作品的情节与场景。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其不错的结果恐怕也不过如此而已。所幸,作为一位有追求的小说家滕肖澜并不甘于此。她偏要将职场中这种纯粹的职业也是自己十分熟悉的行为复杂化,将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这一日常生活中无论如何都回避不开但又又是错综复杂的场景勾连起来,这无异于给自己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职场与日常是“角儿”的土壤

《平衡》中的一号男主葛向阳就是这样“一个角儿”。这个以机场平衡员为职业的他确是业务上的高手,将人与货在机舱那有限的空间内摆布得上下左右妥妥帖帖稳稳当当,一派举重若轻的娴熟与潇洒;然而这位在工作岗位上“平衡高手”于日常生活中却屡屡“失衡”,“憨”态频显,“十三点”不断:在处理与妻子、家人、同事以及朋友间的关系上“情商”甚低,不是此时的言语不当就是彼时的行为欠考,时而“直男”,时而“憨大”,从而使得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时处于一种尴尬状态,而造成种种尴尬的重要缘由之一何尝又



不是在处理人与人、事与事、人与事之间的孰轻孰重、孰缓孰急等关系上的欠考虑、少“平衡”。

为了和葛向阳这一号男主形成对比,滕肖澜在作品中还设计了其他一些角色,这里面既有葛向阳的亲人或同事,如时而妻时而前妻的同事华莉,时而同事时而友人的卢山,以及其他直系亲人或由此延伸开去的种种社会关系。论专业能力,他们都不及葛向阳;论处理协调专业以外种种关系的本事,葛向阳又远不及他们。

这样一来,在滕肖澜的《平衡》中,实际上就出现了两种“平衡”:一是职业所需的专业平衡能力,二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需要的某种平衡能力。前者属于物理学范畴的纯技术问题,后者则可归入社会学领域。两种“平衡”置于不同的行为主体身上,有的能做到和谐统一,有的则只能偏于一极甚至造成某种对立与冲突。我以为,这恰是滕肖澜《平衡》得以存在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平衡》中反复出现不同场景、不同人物相处时因各种“平衡”所需的某种张力以及因张力不足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阅读起来虽有重复之嫌,但这显然是作家的刻意为之。一旦这种张力到了难以控制的时候,作品中的一号男主葛向阳便开始陷入梦境,于是,作品又呈现出现实与梦幻的双层场景。这种职场与日常的冲突、现实与梦境的组合与叠加,最终使得《平衡》跳出了职场小说的窠臼而进入了一种更加开阔、更加立体的叙事空间。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平衡》中有关主人公葛向阳“梦”的场景与描写的确占有一定的篇幅,如何释梦?或又可引入弗洛伊德、荣格一路心理分析学派诸如意识、潜意识,我、本我之类的理论来诠释。这样的诠释看上去似乎更加先锋、高端与大气,但我以为《平衡》的意义与价值从社会学角度予以适度解读更为妥当。

以“平衡”映衬人生的“失衡”

主人公葛向阳在职场上的专业平衡能力当属一流,但他一旦立足于社会这个更广阔的空间中处理人或事的关系,包括与自己至亲的关系时,则不时相形见绌,业务上那种娴熟的平衡能力荡然无存,换个角度说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智商上乘、情商甚低的“畸形男”。滕肖澜刻意塑造出这样一个“双商”分裂的男主一号当属实“别有用心”之举。

不妨拈牛角尖似地解析一下葛向阳在日常生活

滕肖澜长篇小说《平衡》中,出现了两种“平衡”关系:一是职业所需的专业平衡能力,二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需要的某种平衡能力。两种“平衡”置于不同的行为主体身上,有的能做到和谐统一,有的则只能偏于一极甚至造成某种对立与冲突。职场与日常的冲突、现实与梦境的组合与叠加,使《平衡》跳出了职场小说的窠臼,进入了一种更加开阔、更加立体的叙事空间。

中因“平衡”力之失衡而与亲人、朋友产生磕碰乃至激烈矛盾的原因。将他屡次“失衡”的缘由排列下来,再仔细一一权衡,真正关乎是非曲直之争者少之又少,更多的其实不过就是些人情世故、鸡毛蒜皮的琐碎碎碎。这样一个在职场上工作中“平衡”的高手于日常生活中却处处见出笨拙、不自信乃至别扭。如此人生“失衡”的缘由究竟是因葛向阳自己的“笨拙”“直男”“一根筋”所造成,还是由当下社会生活的大环境、大气候所决定?

不妨再看看滕肖澜在《平衡》中特别塑造的龙荣这个角色。对自己这位同事与朋友的感觉,葛向阳有如下评价:“看起来是我劝他,可实际上还是他劝我。他总不动声色地,让人的情绪平静下来。说的也是大实话,不矫情,贴心贴肺。就算我心里再骂他一千遍‘圆滑、百搭、奸臣’,但也不得不承认,有这样一个人兄弟,日子会舒服许多。”一面是“大实话,不矫情,贴心贴肺”,另一面则是“圆滑、百搭、奸臣”。到底哪一面才是真正的龙荣?哪一个龙荣更受用,更在场上吃得开?无论是哪一种答案,有一点肯定无疑:正是因为有了龙荣这样的双面人在现实社会中更能如鱼得水、更吃得开,葛向阳那屡屡“失衡”的尴尬与笨拙才更显突出与无奈。

借“平衡”这一职业映衬出葛向阳人生的“不平衡”,用龙荣的灵活与圆滑反衬葛向阳的“笨拙”与“十三点”,《平衡》骨子里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平衡”高手的这种不无喜剧性的反讽,在我看来就是这部作品存在的最大价值。

《平衡》以大量细节铸成生活的质感,每个角色仿佛都在寻找自己人生中的“平衡”,他们在彼此缠绕中徘徊于现实与梦境。唯让我稍感遗憾的是,作品中的梦境与现实的比照似可更强烈更集中一点,梦虽梦,但将其作为整部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段之一,作家还可以有更好的自由表达的空间。

(作者系中国作协小委员会副主任、文学评论家)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 评论

东江儿女的湾区史诗

——陈雪长篇历史小说《惠州1907》中的叙事美学

□ 于爱成

辛亥革命前夜,惠州七女湖起义这一历史事件,被陈雪以文学之笔精心重构,在《惠州1907》中呈现出了晚清岭南社会生态的全景图。这部作品不仅是陈雪“东江革命历史三部曲”的收官,更是其深耕东江地域革命历史题材的集大成之作。

在《惠州1907》中,1907年的惠州城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既代表着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崩解困局,也展现了世界现代浪潮冲击下中国的边缘爆破。陈雪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细致挖掘与文学加工,让惠州城成为了解剖晚清社会的标本。

惠州七女湖起义在正史记载中常被简化为“未遂的地方性暴动”,但陈雪凭借田野调查与档案互证,发现了这场革命事件背后隐藏的晚清岭南社会结构密码,在小说中构建起以惠州城为中心的多维权力网络:东江航运线上的船民与会党相互勾连,三洲田暴动的义士流落民间,民间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力量随时集结,七女湖起义虽被打散,但辛亥革命后陈炯明、邓铿领导的东江起义军再打惠州并光复,起义军融入国民革命军,成为国共两党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这种空间叙事及纵深开掘,不仅还原了历史现场,更升华了惠州城的象征意义。

陈雪以惠州城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北京、广州、香港、新安、潮州、广西等地,还有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革命力量,如同漩涡般围绕1907年的惠州旋转。三年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大厦倾覆,惠州起义实则是武昌起义的前奏。长期以来,辛亥革命叙事多围绕广州、武汉展开,而陈雪在这部作品中,将大量篇幅给予海外华侨、香港义士、

民间会党,展现了他们的生死不惧。通过这些描写,我们了解到海外华侨如何支持国内革命,会党组织如何从底层改变中国,香港又如何成为支持革命的中转站与桥头堡。陈雪通过这些描写,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惠州1907》的叙事张力源于对时空结构的精妙编织。陈雪没有采用传统线性叙事,而是以1907年惠州起义为叙事焦点,将晚清社会的多重矛盾汇聚于特定时空。作品以知府陈兆棠的官邸、革命志士的秘密据点、市井街巷的茶楼赌馆为坐标,构建起权力、革命与民生的三重空间场域。在官衙的雕梁画栋间,陈兆棠与幕僚们筹谋镇压之策的密谈,与衙门外贩夫走卒的艰难营生形成对位;革命党人邓子瑜、陈纯等在香港、惠州等地的刀口舔血,与东江流域商贾饥民的奔波劳碌构成交错。

在时间维度上,作品以1907年为叙事主轴,却通过人物的记忆闪回与历史事件的互文勾连,将时间线延伸至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历史时刻。当陈兆棠翻阅过往剿匪奏折时,纸页间浮现的是湘军旧部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血色记忆;邓子瑜策划起义时,脑中闪现的是游走于海外侨民间宣传革命筹资募款的孙中山的身影。这种时空的折叠,使得惠州起义不再是孤立的地方性事件,而成为晚清历史逻辑链条中的必然环节。

陈雪的叙事美学,不同于传统的历史演义或新历史主义的解构叙事。他是一位有着鲜明江湖侠义偏好和民间市井情怀的作家,在演义侦探悬疑打斗的类型与历史小说嫁接的基础上,通过蒙太奇将不同时空的经验碎片进行编织,形成了亦新亦旧、亦雅亦俗、江湖与庙堂兼融、英雄与流氓混搭、士夫与

武夫对照的新历史小说美学。七女湖起义距1911年的武昌起义、清帝退位仅三年,这次起义对国运、武昌起义和清朝灭亡的影响,正是其意义所在。惠州包括惠州新安、香港之地,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不容忽视,现代中国正是在南中国的省港之地(包括惠深之地)率先起步的。

人物群像的塑造是《惠州1907》撬动历史重量的文学支点。陈雪摒弃了非黑即白的扁平化处理,在历史必然性与个体偶然性的张力中,描画出复杂立体的人性图谱。知府陈兆棠的形象最具颠覆性,这个在正史中被脸谱化为“酷吏”的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呈现出多维的人格结构,在其镇压会党的残酷手段背后,隐藏着对湘军传统“经世致用”理念的畸形继承。作品中的陈兆棠,既有镇压革命时的冷酷决绝,也有面对家族没落时的颓唐落寞。当他下令对革命党人格杀勿论时,官袍上的仙鹤补子与溅落的鲜血形成刺目对比;而当他在刘克庄《临江仙·潮惠道中》行书挂轴前久久伫立时,他对这首词的困惑和喜欢又泄露了作为晚清士大夫的精神困境。

与陈兆棠形成镜像关系的是革命领导者邓子瑜、陈纯,这两位被史料简化为“起义领袖”的历史人物,在文学重构中获得了丰满的生命细节。他们的理想主义、缜密筹谋,以及在遭遇失败、困境、生命危险、事业的黑暗时刻的反应,都有根有据,合乎逻辑和常识的细节支撑,凸显历史事件进程中人性的因果必然,也展现了偶然特质。书中尾声写到,武昌起义胜利不久,“潮州光复,陈兆棠在潮州被革命军所擒”,11月22日上午8时,革命军将陈兆棠处决。临刑前,陈兆棠拟好遗言致其家属:“不死于君,不死于国,死于因果。”陈兆棠作为与曾国藩有同类才华和抱负的清朝廷大夫,本质上是个体智者,他心中

的“因果”,不仅关乎自己,也关乎时势、大局、人心。陈雪的叙述描写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行文简洁,文字精练准确,写得沉着沉稳,风轻云淡、行云流水。二是对历史、江湖等知识,包括天文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世故、交通经济、气象航运等,做足了功课,经得起考究。作品一上来就已经快速入戏,广州、惠州、香港以及海外各地,黑白两道、官场江湖的各色人等性格分明。陈雪的故事讲述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不假有眼、成竹在胸,有很强的可读性。

更为重要的是,陈雪在《惠州1907》中探索出了一种具有独特史学诗意的语言风格。他将演义体、类型小说与现代小说技法进行融合,将档案文献进行文学转化。在他笔下,历史、方志、文献、传说等与小说叙事熔于一炉,在历史与文学间生成小说的生命体。作品对惠州人文风俗、自然地理、物产民俗、建筑等进行考据式描写:“三街六巷”的描写,精确到麻石路面的纹理,“碎玻璃”反射着惨淡寒光;夜幕下的高宅大院和赌院婚媾,在灯光明灭间营造出历史迷雾般的鬼魅氛围,在读者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惠州1907》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创造的对话性历史认知。当我们从小说中1907年的惠州与21世纪的粤港澳大湾区并置观察,就会发现历史规律与意志的合辙押韵与同气相求。作者对惠州、香港、广州、深圳、澳门等地的文学编码,不仅复活了岭南历史的集体记忆,更通过历史叙事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惠州1907》不仅是为辛亥革命和英勇的东江儿女留下的一部历史传记,更是献给岭南大地和湾区之地的一部文学史诗。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

用天马行空的方式,写一个日常的故事

滕肖澜

■ 创作谈

我不太擅长取书名。通常直到写完,电脑里的存档名依然是《新长篇》,或是《新中篇》《新短篇》,为取名而大伤脑筋。但这次不同。很早我便定下了书名:《平衡》。2019年8月开始构思,前后写了四年。“平衡”既是一个职业,也是一种人生状态和处世哲学。动笔前,我写了一段文字,第一句便是“人生永远在寻求某种平衡。平衡的前提是——‘不平衡’”。

主人公葛向阳是航空公司的平衡员,负责飞机的载重平衡。其业务能力强,尤其擅长B747货机的手工平衡表,几乎是有些病态地,享受着繁冗的数字排列带来的愉悦感,“货舱几十块板,A加B有限制,A加B加C有限制,A加B加C加D又有限制……配置第一块板的时候,就要想到第二块、第三块乃至最后一块。每块板之间都有联系。彼此牵制互为因果。这不是单纯的加法,而是数的无穷次方。手里要有感觉。”工作中,葛向阳是高手,手里有的是感觉。讽刺的是,生活中却是左支右绌,爱情、亲情、友情一团乱麻,失衡失重。

偏偏为人处世的步骤,与画平衡表差不多。走第一步时,就要想到第二步、第三步乃至最后一步……手里也要有感觉。平衡表画错可以重来,有上一份做借鉴,到底省事些。再不济还有个大致范围在那里,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顶多航班延误,吃相差些,重心早晚会落在界内;人生却是没有标准答案。无迹可循,无冤可诉。连个试错的机会也没有。从这点看,葛向阳这个画平衡的高手,竟像个纸上谈兵的笑话了。

当年父亲意外身亡,本该属于葛向阳的一笔巨款,被叔叔和姑姑瓜分去大半,对他们心怀怨愤,但出于中国式家族观念和自身性格原因,到底没有真的闹翻,见面竟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怨气无从排解,只能在梦里发泄,把当年的场景一遍遍重现,梦里快意恩仇,手起刀落。与前妻离婚,却又把她介绍给自己最好的兄弟,想要成人之美。强撑着说说笑笑,面上毫无芥蒂。但终是不甘心,于是在梦里江湖。这倒霉兄弟次次都是炮灰,无钱无势无勇无谋。他找了个风情万种的女友,却始终不信天上掉馅饼会砸中自己,患得患失,在梦里为女友劈腿想了N种情境。反复纠结,好不容易释怀了、想通了,女友竟又真劈了腿,梦境反倒是一语成谶……葛向阳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差口气,坏人也不至于。明明怂得不能再怂,却又时刻处于想找人干架的亢奋状态。被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束缚着,原则反倒是其次了。热闹得一派祥和,荒唐得自成逻辑。久而久之,自己也忘了究竟想如何。想忍耐、凑合,又终是不甘心。于是不停地用力,试图挣脱那个不知是被别人还是被自己束缚的圈。

《平衡》与我以往的写作风格有很大差别。依然是现实题材,写家庭写当下生活,但采取了梦里梦外不断跳跃的形式。梦里的情形与现实呼应,也是互补。一方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现实生活中的遗憾,在梦里可稍作排解;另一方面,梦又对现实生活起推动作用,本来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因了梦的启迪,现实中竟是推波助澜。梦反成了现实的老师,就像文中葛向阳感慨的那样:“梦也是现实主义,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现实中的某种可能性。”这种写法,于我本人而言是一次新的尝试。用天马行空的叙述方式,写一个日常的故事。

最终,葛向阳绕了一大圈,发现前妻华莉既不算跟他复合,也没与好兄弟龙荣走到底,而是跟了个看似一笔带过的人物。那一瞬间,他忽然明白了,“当主要人物站在追光灯下肆意表演的时候,阴影里的NPC们也各自活动着。那是另一个世界。不在主线之内,却自成一体。细节完整,逻辑清晰,没有硬伤。从他们的角度看,追光灯下的人也是NPC”。或许普通人的日子便是如此,你看重的,却往往只是别人眼里可有可无的。

葛向阳的梦,自始至终是为了化解心结。十几年前那个横死的女孩,让他耿耿于怀。他想要得到她的原谅,万般纠结,于是在梦里反反复复,想要“拨乱反正”……他以为是自己懦弱,以至于只能借着梦境,半真半假,啼笑怒骂。可讽刺的是,当他一遍遍地从梦里梦外跳去,把那些情境来回琢磨,像反刍般背得烂熟、吃得精透,不知不觉他竟也成了梦里那些憎恶的人之一。就像文中所说,“不只是羞愧或是自责,而是竟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似乎本该如此,再自然不过了——这才是要命的。我想起这些年做的一个个梦。它们仿佛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而生。但时至今日,问题没解决,反而隐入生烟,散成了无数个细碎的点。天上地下,看不见,却无处不在”。

小说以梦开始,以梦结尾。最终,葛向阳在梦里看清了小女孩的脸,打开了多年的心结,也在现实中亲手撕掉了那份令他羞愧的合同——所幸,他终究是与那些人不同的。这也许只是平凡人生中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决定。也许今夜过后,他又会慢慢活成自己憎恶的人。人生如梦,梦如人生。但无论如何,那刻他是坚定的。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如何,界限在何处。

也许就应了那句,“做人跟画平衡表差不多,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你稍微马虎些,重心指数也在范围内,机长照样会签字。但就是过不了自己这关”。